

# 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

雷百景 茂陵博物馆 馆员

李 雯 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 助理馆员

众所周知，西汉十一帝驾崩之后皆安葬于京都长安近郊的黄土台塬之上，主要分为两大陵区：一为自汉长安城正北方向（渭河北岸）往西延伸的咸阳原陵区，这是以高祖刘邦长陵为中心的主陵区，也可以说是祖陵区，东西横亘约40公里，排列9座汉代帝陵；另一为长安城东南陵区，包括白鹿原上的文帝霸陵和杜东原（少陵原）上的宣帝杜陵。那么，西汉十一帝陵如此排列分布是否还有什么讲究，其陵址的选择到底有没有经过一番周密的规划及地理环境勘察？它们究竟遵循了怎样一种葬仪制度？这一问题是目前西汉帝陵研究的焦点，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十分关注，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大体而言，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汉帝陵遵循了较为严整的昭穆制度。持此观点的学者是《西汉诸陵位置考》的作者杜葆仁先生及《西汉十一陵》的作者刘庆柱、李毓芳先生。

第二种观点认为，咸阳原上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三座帝陵遵循昭穆制度而葬，其它诸陵则无此制。持此观点的学者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的作者杨宽先生。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汉帝陵并

无昭穆之序。霸、杜二陵自然无任何联系，渭北诸陵虽较为集中，然并无昭穆之分，仅可将之分为三个自然区域而已<sup>[1]</sup>。倾向于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西汉帝陵的朝向及其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相关问题》）一文的作者叶文宪先生、《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几个问题》）的作者雷依群先生以及《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以下简称《无昭穆论》）的作者焦南峰、马永赢二先生。

上述三种观点中，前两种提出颇有见解的关于西汉帝陵遵循昭穆制度的看法，而后一种则断然否定西汉帝陵遵从昭穆之制，认为“只有汉陵面向南方，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汉陵有昭穆制度；否则，汉陵有昭穆制度就无从谈起”<sup>[2]</sup>；有的甚至认为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没有事先规划”、“完全出自皇帝个人的好恶”<sup>[3]</sup>，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故提出疑义，略抒己见。

## 西汉帝陵的位置

关于西汉诸帝陵的具体位置，史籍多有涉及。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其中“渭水”条就明确记载咸阳原汉陵位置自西向东依次为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sup>[4]</sup>。此后，《〈汉书〉臣瓚注》<sup>[5]</sup>、《三辅黄图》<sup>[6]</sup>及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sup>[7]</sup>也对汉陵位置作了篇幅不等的记载，皆与《水经注》所载相接近。唐以后直至清初，史籍则少有提及。清《陕西通志》、《关中胜迹图志》、《长安志》、《重修咸阳县志》等，虽也有记载，然大多含混不清，有的仅是只言片语，有的甚至张冠李戴。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于诸陵前立碑正名，结果，他以讹传讹，所立碑石的位置亦多有舛错，如毕沅在今已得到确认的景帝王皇后陵前立碑曰“汉惠帝安陵”，在元帝渭陵前立碑曰“汉昭帝平陵”等<sup>[8]</sup>，此举给后世的科研工作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杜葆仁和刘庆柱、李毓芳等先生先后对西汉诸陵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进一步证实了《水经注》记载的准确性，并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专家的认可<sup>[9]</sup>。

## 昭穆制度的实质

所谓昭穆制度，最初是为宗庙祭祀而制定。它是按照诸帝辈份、血统关系的远近来排列后代子孙与先辈神主牌位的一种制度，也就是

史书上所说的“父为昭，子为穆”<sup>[10]</sup>、“昭位居东，穆位居西”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父子分列、孙祖同列，“始祖居中，左昭右穆”，如周代，以后稷为始祖（实际上亦属昭字辈），后稷之子不窋为穆，后稷之孙鞠复为昭；又如，《左传·僖公五年》中有“太伯、虞仲，太王（古公稟父）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之说。

按照昭穆制度的规定，天子立七庙（1座始祖庙，2座祧庙，4座亲庙即高祖的显考庙、曾祖的皇考庙、祖父的王考庙和父亲的考庙）。在七庙中，在位天子可按照世次的远近祭祀七位祖先的神主，其中，开国之君的神主（如汉高祖刘邦的神主）是永久不变的祭祀对象，它的左右是三昭三穆，正如《礼记·王制》中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在周代，设置有专门负责区分昭穆次序的职官，如《周礼·春官·小宗伯》中的小宗伯、小史等就是这样一类职官，其中的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辨庙祧之昭穆。”这里所说的“祧”，即指祧庙，郑注云：“祧，迁主所藏之庙”，亦即供奉远祖神主的庙。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供奉开国之君神主的庙即始祖庙如上所述永远不迁，对于汉朝天子来说，高祖刘邦就是他们的始

祖，其庙永远不迁，叫百世不祧之祖。

昭穆制度主要用于宗庙祭祀上，而用于陵墓建设之上并见诸文献记载者少之又少，作为古代中国封建大一统时代的西汉王朝十一帝陵，从其规整的陵园布局及诸陵陵主彼此之间的世袭关系上，我们仍可寻到古时昭穆制度的踪迹。西汉十一帝陵排列整齐有序，父辈依祖辈，晚辈依长辈，血统关系越亲近，他们的陵墓距离就越近<sup>[11]</sup>，这一分布现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礼记·祭统》中“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的昭穆实质。

### 西汉帝陵遵昭穆之序

考古资料已经证实，西汉诸帝陵的正门与秦始皇帝陵一样，皆朝东<sup>[12]</sup>，东墓道最长，是主墓道<sup>[13]</sup>，这是“汉承秦制”的又一例证，说明一个问题：秦汉时期皆以西方即古人所谓右方为尊（西汉帝陵园中，一般都是帝陵坐西向东居于右，后陵和将臣陪葬墓在帝陵以东居于左，似匍伏于帝陵脚下，象征文武百官朝谒之仪）。近年来，随着西汉诸陵主墓道及陵园正门方向的逐步确定，有关汉陵葬仪制度尤其是西汉帝陵是否遵从昭穆之制的问题便成为专家学者们频频涉猎的热点。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杜葆仁、刘庆柱、李毓芳先生通过对西汉诸帝陵进行详细考察和充分论证之后就得出西汉帝陵遵从昭穆制度的结论<sup>[14]</sup>，只是当年得此结论的时候，有关西汉帝陵主墓

道和陵园正门朝向问题（朝南还是朝东）的争议尚在进行之中。为了解决争议，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高祖长陵、汉太上皇陵、景帝阳陵以及宣帝杜陵等汉代诸陵进行了细致的踏查、考古钻探和分析论证，并结合史籍上有关“汉承秦制”的记载，终于认定“西汉诸陵的正门无疑朝东”。之后，有的学者便据此推断：西汉帝陵并未遵从昭穆制度，如《相关问题》一文中就说：“如果长陵、安陵和阳陵是朝南的，那么还可以认为它们是按左昭右穆的古制排列的。然而实际上三陵都是朝东的，这样长陵、安陵和阳陵就大致成东西一线分布”、“哪里有什么昭穆关系可言呢？”《几个问题》也说：“在考古调查中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汉代帝陵的正门基本上都是东向”，“据此推断，整个咸阳帝陵的分布将排列成坐西面东的一字形，是很难看出昭穆序列的。”《无昭穆论》持有与此相同的看法，文中说：“汉陵遵昭穆的结论是以西汉帝陵面向南方为基础的，因为汉陵如果面东或面西，现在的布局则成为一字形，‘左昭右穆’变成‘前穆后昭’或‘前昭后穆’”。其实，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相关问题》、《几个问题》和《无昭穆论》的作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他们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无疑，在他们心目中，所谓“左”与“右”是随帝陵正门朝向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看法是以“我”为中心基点，以今人心目中“上（前）北下（后）南、左西右

东”的地理方位概念及现代人日常生活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微观意义上的“前”“后”“左”“右”去套用古人所制定的“左昭右穆”制度的。事实上，在古人尤其汉代人的心目中，“天圆地方”、“南北东西”、“前后左右”乃亘古不变的真理，是宏观意义上的地理方位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事物本身的位置或所处方向如何变化（咸阳原汉帝陵的正门无论朝南还是朝东），“东”方永远都指代它的“左”方，“西”方永远都指代它的“右”方，“南”指代“前”、“北”指代“后”，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考古资料及文献史籍中所见到的“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左（东）青龙”、“右（西）白虎”<sup>[15]</sup>之说。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以汉陵（包括始祖陵刘邦长陵在内的每一座汉代帝陵）为中心基点所说的地理方位“左”与“右”并不随帝陵正门朝向而发生变化，而始终与“东青龙”、“西白虎”相一致。在此，我们有必要根据上述结论并结合陵园正门朝东的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来看看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置：阳陵无疑位在长陵的左（东）边，并非“前”边（称“阳陵位在长陵的‘前’边”或“长陵位在阳陵的‘后’边”，这是我们今人的地理方位概念）。其它帝陵之间的相对位置依此类推……

在搞清了“方位”之后，即可把咸阳原上的三组帝陵（东区的长陵、安陵、阳陵；西区的茂陵、平陵；中区的渭陵、延陵、义陵）与

“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的昭穆葬序制度以及汉人韦玄成所列元帝之前诸帝昭穆序列<sup>[16]</sup>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考察。

结合汉韦玄成所列元帝之前诸帝昭穆序列，西汉十一帝的昭穆排行顺序应当是：

高祖 { 昭位：景帝、昭帝、宣帝、成帝  
穆位：惠帝、文帝、武帝、元帝、  
哀帝、平帝

在咸阳原祖陵东区，我们根据古人的方位观，便不难看出，处于左侧（东）的始祖位刘邦长陵即是“左昭”位，右侧（西）的惠帝（刘邦子）安陵则是“右穆”位，始祖位左侧（东）的景帝（刘邦孙）阳陵复为昭位，恰符合古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的制度，它不正与韦玄成所列汉帝昭穆排行相吻合？

同样，“左昭”、“右穆”也适用于咸阳原祖陵西区的昭帝平陵和武帝茂陵。这里要着重谈一谈葬于茂陵的汉武帝。武帝刘彻为高祖刘邦曾孙、惠帝刘盈的孙辈，景帝刘启之子，是继惠帝刘盈之后的又一“穆位”皇帝，所以理应葬于惠帝安陵的西邻。可早在文帝刘恒时代，就于阳陵陵区东邻地带建立了祭祀神明的渭阳五庙。如此说来，汉家茕域再也不能向“五庙”以东延伸，否则就严重违背礼仪，侵犯“神明之舍”<sup>[17]</sup>。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则是：景帝阳陵以东咸阳原区地域狭小，再往东即接近泾渭二水交汇处，地势低凹，不适宜筑建帝陵。武帝刘彻是一位颇具个性的封建君主，他考虑到景帝以后

西汉时代属于“昭位”的皇帝陵址安排这一现实问题，为了避其祖父文帝所建“五帝庙”之讳，也为了替其后代子孙们排忧解难，开拓更为宽阔的茕地，便决定将自己的寿陵营筑在远离惠帝安陵更西方向的槐里茂乡一带，从而为后世子孙在安陵以西茂陵以东辟留出东西长达五十余里的茕域，此后，属于“昭位”的西汉帝陵，便可以茂陵作祖位，均葬其东，如武帝之后的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即是；而属于“穆位”的帝陵仍旧以长陵作祖位，均葬其西，如后来的元帝渭陵、哀帝义陵即是。

至于谈到咸阳原祖陵区以外的文帝葬霸陵和宣帝葬杜陵，笔者以为绝不能说成是“出自他们二帝的好恶”<sup>[18]</sup>，只能说“文帝与先帝惠帝辈份相同，同属穆位”，而“宣帝是先帝昭帝的孙辈，虽为隔辈继承，但二人同属昭位”，对于他们二帝来说，先帝皆已入葬咸阳原祖陵区，由于受到昭穆制度的约束，二帝皆“不得已而为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为自己另辟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帝才选中了依南山傍灞水的白鹿原作为葬身之地，这里地势险峻，“固不可发”，也正符合文帝生前选择墓地时对群臣所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槨，用紵絮斲陈，絜漆其间，岂可动哉！”<sup>[19]</sup>的初衷；而宣帝少时则“好游户杜间，故葬此”<sup>[20]</sup>，他选中自己少年时代乐游之地——户杜一带（杜东原）作为建陵之地。杜东原背依南山，傍灞水，在古人心目中，也称得上是绝好的风水宝地。

当然，要说不遵昭穆制度，西汉十一帝陵中仅有一座，那就是最末一位君主——汉平帝刘衎的康陵。汉平帝与哀帝刘欣辈份相同，同属穆位，14岁时暴亡，其身后事由逆臣王莽操纵安排，难怪位于渭陵和延陵之北、安葬平帝的康陵成了惟一不遵祖制的西汉帝陵。

注释：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 [2] 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5期。
- [3] [18]雷依群：《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6期。
- [4] 《水经注·渭水》载：“成国渠，其渎上承潏水于陈仓东，东迳眉及武功槐里县北，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1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之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坂即龙渊庙。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平陵，东南去长安70里……又东迳长陵南……又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为之周氏曲。又东南迳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
- [5] [6]《<汉书>臣赞注》、《三辅黄图》：除前者记载“长陵去长安城35里”、后者记载“长陵在长安城北40里”外，有关其它记载，二者皆一致，如惠帝安葬在

长安北35里，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45里，武帝茂陵在长安城西北80里，昭帝平陵在长安城西北70里，元帝渭陵在长安城北56里，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62里，哀帝义陵在扶风渭城西北原上，去长安46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60里兴平原口。

- [7] 《元和郡县志》以唐时的咸阳为基点，记载了当时咸阳到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里数，指出：长陵在咸阳东30里，安陵在咸阳东北20里，阳陵在咸阳东40里，平陵在咸阳西北20里，渭陵在咸阳西北7里，延陵在咸阳西北13里，义陵在咸阳北8里，康陵在咸阳西北9里。
- [8] 毕沅将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南的元帝渭陵误认作昭帝平陵，将景帝阳陵东北孝景王皇后陵误认作惠帝安陵，又将昭陵平陵东南上官皇后陵误认作哀帝义陵。
- [9] 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0] 《汉书·韦玄成传》。
- [11] 血统关系越亲近，他们的陵墓距离就越近：如惠帝刘盈葬于父亲刘邦长陵紧邻，成帝刘骥葬于父亲刘爽渭陵紧邻，昭帝刘弗陵葬于父亲刘彻茂陵紧邻；而在刘邦长陵、元帝渭陵的另一侧，景帝刘启葬于祖父紧邻，哀帝刘欣也葬于祖父的紧邻。
- [12]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

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 [13] 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4] [17]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5] 《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其实，古人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一说从唐初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碑林集刊·七》汪勃撰“四神的方位及其首尾方向”一文中说：“在唐代，出现了与现今的方位概念一致的四神配置，这种新的配置开始于初唐，少见于盛唐、中唐，而多见于晚唐。”）我们今人所谓“上（前）北下（后）南”、“左西右东”的地理方位概念正是对古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说的大变革！
- [16] 《汉书·韦玄成传》：“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
- [19] 《史记·张释之传》。
- [20] 《三辅黄图》：“帝好游户杜间，故葬此。”